

后殖民主义视角下的翻译

——以达文波特英译《萨迦格言》为例

李正栓, 崔佳灿

(河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石家庄 050024)

[摘要]《萨迦格言》作为有重要影响力的藏族文学经典作品, 已被翻译成四种英译本流传世界各地。达文波特的英译本虽然深入、详尽, 但存在很多对汉藏文化的误读。其原因在于译文中采用的归化翻译策略受到了后殖民主义影响。译者主体性作为翻译策略选择的先决条件, 使得文本建构中受到意识形态的制约。

[关键词]《萨迦格言》; 后殖民主义; 东方主义; 翻译策略

doi:10.3969/j.issn.1673-9477.2014.01.026

[中图分类号] I0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477(2014)01-085-04

《萨迦格言》是西藏著名学者萨班·贡嘎坚赞所著的一部格言体哲理诗集, 成书于公元十三世纪, 至今已有七百余年。《萨迦格言》作为格言诗中的代表作, 以其短小精炼、言简意赅、寓意深刻的特点, 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它使用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自然现象、民间典故、谚语等为媒介, 运用丰富的比喻、推理手法, 来叙述社会生活中的宗教观念、道德规范、以及修行方法等, 来解答人们的疑惑。”(李正栓, 2013:1)

萨班·贡嘎坚赞作为宗教领袖人物, 他以藏传佛教为标准, 对西藏当时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 经过全面观察和认真思考, 提出了自己的一系列看法。按照他的主观意愿, 格言是分辨光明与黑暗、智慧与愚蠢、正确与错误的标尺, 恪守格言行事, 才能实现心目中的理想境界。因为他的宗教和文化背景, 《萨迦格言》中无不渗透着藏传佛教的影响。宗教作为文化整体的一部分, 必然在文化背景中获得生存的土壤, 并得以流传。藏族文化被藏传佛教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在《萨迦格言》中得以充分体现。

《萨迦格言》作为一部有重要影响力的著作, 现存有四个英译版本: 詹姆士·E·薄森(James E. Bosson)翻译的《格言宝库》(*A Treasury of Aphoristic Jewels*, 1969); 藏传佛教徒塔尚·塔尔库(Tarthang Tulku)翻译的《雅丽格言》(*Elegant Sayings*, 1977); 约翰·T·达文波特(John T. Davenport)翻译的《普通智慧: 萨迦·班智达良言宝库》(*Ordinary Wisdom: Sakya Pandita's Treasury of Good Advice*, 2000)和李正栓翻译的

《藏族格言诗英译》(2013)。就这四个译本来看, 达文波特的译本是一个比较完整的、研究深入的、充满详解的译本。(李正栓, 2013:12)

达文波特是美国人, 曾为西藏流亡政府计划委员会供职, 对十四世达赖喇嘛很是效忠, 他本着给当代西方人传播藏族文化的思想完成了《萨迦格言》的翻译。从他的译本来看, 他不但完成了格言诗的翻译, 还把诗行背后的小故事以及相关的背景知识不厌其烦地加在翻译文本中, 其传教性和说教目的不言自明。

一、后殖民主义视角下的翻译研究

后殖民主义作为二战后新殖民批评和解殖民化的继续, 是一种具有强烈政治性和文化批判色彩的学术思潮。通过研究从前欧洲殖民地以及与之相关的其他地区的文化, 后殖民主义质疑西方社会所鼓吹的殖民好处(例如说它“带来文明”、“带来英国的文学传统”、“带来启蒙思想”), 提出了种族主义和剥削等问题, 而最主要的是殖民和后殖民的主体地位问题。随着东西方文化交流日益频繁, 相互尊重与平等对话成为当今世界文化交流的主旋律。但应当注意的是, 由于历史原因, 东西文化并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 相较于西方文化, 东方文化始终处于弱势地位。西方人习惯以欧洲为中心, 带着强烈的民族沙文主义进行文化传播。由于这种心理的存在, 使得西方人在翻译东方文本时就不免戴着有色眼镜, 把他们对东方的偏见与误解写进译本中, 正因为此, 基于后殖民主义框架的翻译研究

[投稿日期] 2014-01-04

[基金项目] 教育部2013年人文社科课题《藏族格言诗英译研究》(13Y5A74030)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李正栓(1963-), 男, 河北保定人, 教授, 博士,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英美文学、英汉诗互译及译评。

应运而生。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者认为,翻译研究有必要借鉴文化研究的各种方法,而文化研究则不应该忽视翻译活动在文化互动方面的关键作用,翻译文本正是跨文化影响和传播的直接证据。

(Bassnett & Lefevere, 1998:136)

爱德华·萨义德作为后殖民主义思潮中东方主义的代表人,他所著的《东方主义》通过考察欧洲对中东的再现,论述了东方主义的思想方法如何影响着学术研究。在这部著作里,萨义德指出西方所谓的客观、中立、不受政治影响的东方研究充满了偏见和误解:东方主义研究的范围就是帝国所达到的范围,东方学是帝国主义实施掠夺和控制的必要装备,东方主义者和白人是可以互换的名词。《东方主义》揭露了权力和知识之间的关系,指出知识不可能脱离其产生的环境,没有纯粹的非政治的知识,知识往往是为权力和统治服务的,人文学者的研究深深根植于历史语境之中。萨义德还指出,东方学在建构东方、依据西方的利益丑化和污蔑东方的过程中,所使用的技巧之一就是翻译,翻译同词汇学、语法学、文化解码学等手段一样,是东方学赖以形成的重要组成部分。(Said, 1978: 121)

萨义德直接论及翻译的材料委实很少。翻译实质上是文化的传递,如果我们延伸到文化间的翻译,那么赛义德的思想就与后殖民主义密切相关了。萨义德的东方学反映的东方并不是真正的东方,东方学关心的也不是东方,而是西方的利益,是西方如何认识东方进而征服东方的学问。这样东方学就成为一种定型的、不变的、被概括化的形象。赛义德还指明了知识与政治的关系,这正是后殖民翻译研究的立足点之一。翻译研究如果仅仅从语言文字、文本间的转换入手,就无需关注语境和外部的权力关系或强弱对比关系;如果仅仅从交际效果入手,那么只要保持交际无障碍即可,也就无需关注外部环境对交际效果的影响。正是基于翻译和文化都要受到权力制约的影响,萨义德认为:纯粹的学术、中立、不带偏见的知识是不存在的。知识是现实的译文,知识离不开政治,译文也就不可能脱离政治。译者介入译文不可避免,译文不可避免地体现译者立场。权力关系通过译者影响着译文。反过来,译者也可以通过译文对权力关系做出反应。译者、译文与权力关系是相互制约、相互驱动的。(吴文安, 2008:65)

达文波特在英译《萨迦格言》时,不仅完成了

457条《萨迦格言》的翻译,还从印度古木寺(Ghoom Monastery)引入了对每条格言诗做的详尽解释。这种译法在名义上是要不偏不倚,保持原汁原味,但是达到的效果却让读者明显感觉到东方的“他者性”——东方与西方的文化差别是如此迥异,以至于需要做大段的解读阐释。这样一来,作为“东方学家”的达文波特就成为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之间的中介,东方的形象就由他们来为西方人塑造,西方人眼里的东方就完全被东方学家所操纵。

二、达文波特英译《萨迦格言》中采用的翻译策略及后殖民主义体现

语言和文化密不可分。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之一。语言必定反映文化。翻译不仅仅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更是两种文化之间的转换。在处理文化差异时,翻译界常用“归化”和“异化”两种策略对其进行处理。归化和异化由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于1995年在《译者的隐身:一部翻译史》(*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中提出。他认为“归化翻译是指译文要采用透明、流畅的风格,以使译语读者对外来文本的陌生感降到最低度。”(Shuttleworth M, Cowie M, 1997: 44);而异化翻译是指“译者在翻译时,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原文的异质性,故意打破译语的种种规范。”(Shuttleworth M, Cowie M, 1997: 59)

韦努蒂翻译策略理论的一个重要根据是后殖民主义,韦努蒂在《译者的隐身:一部翻译史》中提到的几个术语,例如霸权、抵抗、异质性等都是后殖民主义批评中的主要术语。再者,韦努蒂在其著作中也多次提到后殖民主义的核心人物萨义德以及东方主义。(Venuti, 1995:159,177)另外,韦努蒂用了比较长的篇幅评述了奈达(Eugene Nida)的动态对等和功能对等学说。他认为奈达所倡导的“自然流畅的译文”恰恰代表了英美文化的流畅诗学主流。奈达提倡用译语的对等成分代替源语,实际上是在宣扬把英语的透明话语强加到其他文化之上。奈达的动态对等理论看似合理,能克服语言与文化差异,实际上是以排除文化差异为代价的。由上可见:韦努蒂的异化翻译策略理论借助语言的文化差异,发掘译语的异质成分,释放其余成分,以求瓦解英美文化霸权。后文将就达文波特英译《萨迦格言》时采用的翻译策略进行分析。

1. 原文:污蔑净饭王子他还要爱护你,恭敬阎

王他还是会要你的命。(次旦多吉, 1985: 27)

达文波特译: Bodhisattavas are compassionate even if abused;

The Lord of Death kills even when paid tribute. (Davenport, 2000:100)

净饭王子是对佛祖释迦牟尼出家前的称呼, 他的父亲净饭王是古印度迦毗罗卫国的国王, 故称净饭王子。净饭王姓乔达摩, 名叫首陀那。实际上净饭王子应意为“首陀那的儿子”。在达文波特的译文中, 达文波特虽然直接采用音译这种异化翻译策略, 却把“净饭王子”翻译为“Bodhisattava”。“Bodhisattava”意为“菩萨”, 达文波特的翻译属于西方人对藏传佛教文化的误读。

2. 原文: 勇猛之狮和转轮王, 均无需别人的帮助。(次旦多吉, 1985: 4)

达文波特译: The lion, king of beasts, and universal monarchs

Have no need of allies for their rule. (Davenport, 2000:40)

转轮王是藏传佛教中的一类佛。相传转轮王即位的时候, 从天得到宝轮, 通过转动宝轮降服了四方, 所以称为转轮王, 按照梵语的表达应该为Cakravarti-rajā。达文波特把转轮王翻译为“universal monarchs”, 意为“世间的主宰者”。鉴于转轮王并非佛教的主宰者, 而只是其中的一位佛, 达文波特的归化译法夸大了转轮王的作用, 是对藏族文化自以为是的误读。

3. 原文: 神仙发怒时也会护佑众生, 阎王高兴时也会索人性命。(次旦多吉: 1980:27)

达文波特译: Even when angry, the gods protect sentient beings,

And even when smiling, the Lord of Death kills. (Davenport, 2000:99)

在这则格言诗中, 达文波特把“神仙”使用归化译法译为西方人熟知的“god”。达文波特使用基督教的文化意象代替了佛教的文化意象, 从而在根本上抹杀了不同宗教背景下的文化层次。从后殖民主义角度, 中国作为边缘国往往是宗主国“强大神话”的虚弱陪衬, 达文波特的翻译表现出藏族文化在面对西方文化时的自我贬损。西方的强权政治利用其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文化, 试图控制、重构, 进而剥削东方。由此看来, 译者无异成为帝国主义的帮凶。

4. 原文: 为了医治身上的病痛, 常常使用针砭灸灸。(次旦多吉, 1980:73)

达文波特译: Those who desire to heal their bodies,

Cure disease by bloodletting and surgery. (Davenport, 2000:217)

“针灸”本是藏汉医学共同使用的治疗方法, 它通过经络、腧穴的传导作用, 以及一系列的定位方法来治疗全身疾病。随着中国文化在国外的传播, 针灸这种医疗方式早已进入外国人的视野, “acupuncture”这个词也为人所知。达文波特把“针灸”翻译为“bloodletting and surgery”, 这指的是旧时西医诊治病人时采用的外科手术和放血疗法, 在意义上与原文完全不同。这体现出西方文化作为一种强势文化, 对藏族文化这种弱势文化进行支配。翻译作为联系两种文化之间的桥梁, 就成为弱势文化和强势文化在权力差异语境中不平等对话的产物。翻译文本中的问题不仅是语言转换过程中的问题, 更是文化差异造成的问题。

5. 原文: 顶月神头上的月亮, 却被阿修罗当成食品。(次旦多吉, 1985: 52)

达文波特译: The moon ornament on mighty Siva's head

Is devoured lesser gods. (Davenport, 2000:157)

在佛教中, 阿修罗是半人半神的大力士。他曾多次与提婆神恶战, 但阿修罗也信奉佛法, 是佛教护法神天龙八部之一。达文波特把“阿修罗”翻译为“lesser god”, 意为“次要的神”。这种归化译法首先没有忠实传达出原文蕴含的文化信息, 其次使用西方人的基督教意象来代替东方人的佛教意象, 这是对东方文化的错误建构。

从上面例子可以看出, 达文波特在翻译《萨迦格言》时多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而这种翻译策略的应用虽然容易被译语读者接受, 也不免打上了后殖民主义的印记。

三、后殖民主义对翻译工作的意义和影响

后殖民主义在翻译研究中首次关注文本外的权力关系, 为翻译研究和翻译批评提供了新的视角。以往的翻译理论多为建立在对语言进行分析的基础上, 而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则摆脱了单一语言研究的束缚, 运用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等领域的研

究成果,通过分析来自不同文化的文本和行为,构筑了翻译批评的新范式。

后殖民主义翻译提倡各民族文化和语言的平等关系,使在翻译理论体系中处于支配地位的西方翻译理论体系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从而使翻译研究不再拘泥于西方强势文化的翻译模式。这有利于发展一个均衡多元的翻译理论体系。

后殖民主义视角下的翻译研究为我们反思中国的文化和翻译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空间。翻译既会促进全球文化发展,也会促进全球文化的多元。同时翻译可以危及弱势文化,也可以成为一种保护语言的机制。诚然,汉语在国际上有重要的地位,但不等于汉语就没有衰退和消亡的危机。在西方文化为主导的社会中,弱势文化需要保持警惕,在吸取强势文化精华的基础上,努力发展自身文化,全力促成各种民族和各种文化共同繁荣的局面。

四、结语

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跨语言的交际活动,是由译者的特点所决定的。译者受到身份、宗教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导致其在翻译过程中会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达文波特作为传播宗教的美国人,在其《萨迦格言》英译本中体现出对传统藏族宗教和文化的误读。究其原因,是西方人在后殖民主义影响下,以西方人的思维模式试图对东

方文化进行重新建构,以控制、殖民和君临东方的一种体现。尽管受到意识形态的制约,达文波特的译本对于推动汉藏文化在西方的传播,扩大藏族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起到了建设性作用。

参考文献:

- [1] Bassnett, Susan and André Lefevere, eds. *Constructing Cultures: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C]. Cl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1998.
- [2] Davenport, John T. *Ordinary Wisdom: Sakya Pandita's Treasury of Good Advice* [M]. Boston: Wisdom Publications, 2000.
- [3] Said, E.W. *Orientalism* [M]. London and Henley: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8.
- [4] Shuttleworth M, Cowie M. *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 [Z]. Manchester: St. Jerome, 1997.
- [5] 次旦多吉. 萨迦格言 [M]. 拉萨: 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0.
- [6] 李正栓. 藏族格言诗英译 [M]. 长春: 长春出版社, 2013.
- [7] 李正栓. 藏族格言诗翻译史略 [J]. 燕山大学学报, 2013(14): 9-12, 2013.
- [8] 吴文安. 后殖民翻译研究-翻译和权力关系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8.

[责任编辑 王云江]

Postcolonial translation study — Based on John T. Davenport'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Sakya Legshe*

LI Zheng-shuan, CUI Jia-c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24)

Abstract: As an ethical literature of great importance, Sakya gnomic verses has been translated into four English versions. John T. Davenport's version, although profound and detailed, still corrupts Sino-Tibetan culture. The reason is that the employment of domestication method is influenced by post-colonialism. The subjectivity of translator serves as the perquisite of the use of different translation methods which leads to the restriction of ideology in textual organization.

Keywords: Sakya gnomic verses; post-colonialism; orientalism; translation method